

我眼中的阿拉法特(上)

时延春

长期以来,阿拉法特为巴勒斯坦事业和中东问题不停地奔波,一半时间在飞机上度过,故人们称他为“空中总统”。

自2001年12月3日以来,阿拉法特一直被以色列军警“软禁”在约旦河西岸拉马拉的官邸内。2002年9月20日,以军再次围困其官邸,将官邸大部分建筑炸毁,进一步逼近他的办公室。阿拉法特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以色列军警的监视之下,已经成为笼中之鸟。2003年5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在伊拉克的主要军事行动结束,接着又很快启动了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布什与以色列沙龙政府采取一致立场,试图将阿拉法特从巴以谈判中排挤出去,彻底结束他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领袖地位。2003年9月11日,以内阁会议决定驱逐阿拉法特,甚至一些成员还扬言要暗杀阿拉法特。以内阁的这一决定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巴人接连举行示威游行,表示坚决支持和捍卫阿拉法特;世界各国领导人和舆论纷纷表态,反对以的这项决定;第58届联合国大会于2003年9月19日举行紧急特别会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要求以色列不要驱逐阿拉法特,停止对他的安全进行任何威胁。阿拉法特自己一再强调,他宁愿战死,也不会屈服,他要与巴勒斯坦事业共存亡。这一悲壮的情景不由得勾起了我对阿氏的回忆。

在我珍藏的相册里,有几幅照片在我心中占有特殊地位。一是1984年5月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阿拉法特时我为他们当译员的照片;二是1984年3月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约旦会见阿拉法特时我为他们当译员的照片;三是1985年11月我在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工作时与阿拉法特在开罗欧鲁巴宫的合影。

阿拉法特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他是巴人杰出的代表,是位传奇人物。每次见他,我都注意观察他的风度,他总是头缠黑白或红白格头巾,身穿墨绿色军装,腰挎一把手枪,俨然是个久经沙场的军

队指挥员。究竟手枪里有没有子弹,却一直是个谜。

对阿拉法特头巾颜色的含义,他自己解释说:黑白方格代表巴农民,红白方格代表贝都因人,方格中的白色代表城市居民。阿拉法特说,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他在以色列占领区生活了4个多月,他效仿当地农民戴这种方格头巾,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戴这种头巾,借以显示他的独特风格。

每次与阿拉法特握手,我也都留意他的外貌。他高高的鼻梁,面容清瘦,两眼炯炯有神,目光如剑。记得与他在开罗欧鲁巴宫见面时,他显得特别热情,他称我为老朋友,紧握我的手,拥抱相吻。这种热烈场面使我顿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感。

每当我与他或他姐弟交谈时,我还有意识地研究他的情愫。他是一位有血有肉、富有感情的长者。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镇定自若,奋不顾身,气贯长虹,而平时,他总是面带笑容。尽管他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地操劳,但却时时关心着周围的人,与大家唠唠家常,询问别人的健康状况和家庭情况,使人们感到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父兄。

每当听他演讲,我特别喜欢欣赏他的气质。他声音洪亮,铿锵有力,不时挥动着有力的双臂。他的言谈和演说都富有战斗力和号召力,充满哲理、智慧与活力,方向明确,使人感到正义在他一边。

多年来,阿拉法特留着满腮的花白胡子,人们问他为何不刮掉胡须时,他解释说,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都喜欢留胡子,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每天刮胡须要花15分钟,每个月就要花去450分钟,亦即7个半小时,这纯粹是浪费时间。所以,他不刮胡子算是他的另一种独特风格吧。

阿拉法特于1929年8月4日出生在耶路撒冷一个巴勒斯坦家庭,取名为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乌夫·阿拉法特,后他在加沙读小学时,老师为纪念死去的战友亚西尔,便为他改名为亚西尔·阿拉法特,以勉励他长大后继承巴勒斯坦革命先辈的遗志,完成他们未竟事业。在巴解组织中,他的绰号叫阿

布·阿马尔。阿拉法特排行第六，有两个姐姐、三个哥哥和一个弟弟。父亲叫阿卜杜·拉乌夫·阿拉法特，出身在一个商贾和宗教大家庭，属穆斯林逊尼派。这个家庭的祖籍分布在加沙地带和汗尤尼斯地区，与侯赛尼家族有亲缘关系。阿拉法特的母亲扎哈娃·侯赛尼来自在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区很有影响的侯赛尼家族。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家族的代表人物——加沙地区伊斯兰首领阿明·侯赛尼曾领导当地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及犹太人的统治。由于英国殖民当局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向阿拉法特的父亲施加了很大压力，他被迫背井离乡到达开罗。这样，操持家务、抚养孩子的重担便全部落到扎哈娃身上。扎哈娃生于加沙，勤劳贤惠，但令人惋惜的是，艰难的岁月和沉重的负担损害了她的健康，阿拉法特4岁时，她就离开了人间。

阿拉法特的童年生活十分艰辛，苦难的生活使他养成坚忍不拔的性格。母亲去世后，他与弟弟法塔希便被送到加沙，由舅舅沙特·侯赛尼抚养。不久，兄弟二人又被送到开罗，由大姐英阿姆照管。

英阿姆一直住在开罗。1984~1985年，我在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工作，结识了英阿姆，过往甚密，留下了值得回忆的合影。英阿姆满怀深情地向我谈到她弟弟阿拉法特的一些情况，她说，阿拉法特小时聪明勇敢，常模仿军人动作，做些带有军事色彩的儿童游戏，是个“孩子王”，放学后便带着小伙伴们操练。他手拿指挥棒，俨然像个指挥官，向小朋友们发号施令。当她看到这一情景时，便亲切地叫他“将军”。“训练”结束后，他就把大姐给他的糖果分给小伙伴们吃。有时候，阿拉法特在院子里搭个帐篷，晚上睡在里面，体验一下军人生活。

青年时的阿拉法特已成为一个富有强烈正义感的爱国主义者。在政治上他早熟，较早地参加了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学生运动。在中学时代，他加入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组织。1945年，参加了巴勒斯坦阿拉伯党，组织了“殉教者阿布·哈立德团体”，该团体后成为加沙地区最大的秘密组织。他先在加沙参加反对犹太秘密武装组织的战斗，后去耶路撒冷从事与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活动。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成立后，阿拉法特随全家流亡开罗。在开罗学习期间，他积极参加埃及学生组织的反对英国占领军的示威游行，同时，开始参与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负责用巴勒斯坦爱国志士

筹措的款项购买武器，送往巴勒斯坦。

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正在开罗大学的前身——福阿德一世大学工学院读书的阿拉法特毅然弃学从戎，投身反以战争。1949年，阿以停火协定签署后，阿拉法特回到加沙，参加反以斗争，1950年又重返开罗，继续在福阿德一世大学工学院学习。这段时间，阿拉法特一面着手建立巴勒斯坦学生组织，另一方面参与埃及爱国人士组织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活动，结识了埃及自由军官组织中的一些成员，成为纳赛尔的崇拜者。1952年上半年，阿拉法特当选为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血气方刚的他率领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埃及国王法鲁克的封建统治。这次示威游行大大提高了青年学生领袖阿拉法特的声望。

1952年7月23日，以纳赛尔为首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法鲁克国王的封建统治，建立了共和国，由穆罕默德·纳吉布出任第一任总统。这年，阿拉法特写了一份血书去见纳吉布，要求埃及领导人不要忘记巴勒斯坦事业。这充分说明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祖国、怀念故乡的亲人，对受苦受难的巴勒斯坦人民怀有无限深情，开始考虑成立一个巴勒斯坦组织的问题。

1955年，阿拉法特从开罗大学工学院毕业，进入埃及军事学院学习。1956年，他率巴学生代表团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世界大学生大会。1956年10月底，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法特自愿应征入伍，奔赴前线。作为预备役少尉军官，他率一支爆破队参加了保卫塞得港的战斗。战争结束后，阿拉法特回到开罗，在埃及工程兵部队任职，被授予中尉军衔。1956年底和1957年初，他与战友阿布·伊亚德等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巴勒斯坦志士们应该向何处去？开始酝酿成立“法塔赫”组织。

1957年，阿拉法特到科威特，在一家建筑公司任工程师，以此为掩护，从事组建秘密组织工作。他先与战友阿布·杰哈德等人成立了“法塔赫”组织的第一个秘密支部，并积极进行于1959年正式成立的“法塔赫”的筹备工作。在阿拉伯语中，“法、塔、赫”三字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三词的字首。该组织的战略是大力宣传巴勒斯坦事业，开展武装斗争，解放巴勒斯坦，出版有《我们的巴勒斯坦》杂志，后改名为《法塔赫》。接着又建立了法塔赫的下属军事组织——“暴风部队”、法塔赫组织

系统,规定法塔赫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大会闭会期间由革命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革命委员会相当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为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下设主管军事工作的“暴风部队”总司令部和主管财务、组织和宣传的办公室。1960年,阿拉法特当选为法塔赫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后他一直担任法塔赫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暴风部队总司令。1963年,法塔赫在阿尔及尔设立第一个办事处,成为巴各民族主义组织中的最大一个。而暴风部队则是这些组织中最大的一支游击队武装力量。

1964年5月,阿拉法特参加了在东耶路撒冷召开的第一届巴全国委员会会议,巴各界代表都出席了会议。大会通过了谴责英、美帝国主义对阿拉伯事业的立场与坚决同犹太复国主义侵略作斗争的决议。大会通过了《巴勒斯坦民族宪章》。宪章宣布巴勒斯坦是一个阿拉伯家园,是不可分割的领土单位,巴人民对此拥有合法权利;强调所有巴人都应站在同一条民族战线上,以彻底的献身精神,为解放自己的家园共同努力。大会宣布建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负责巴人解放家园的斗争。大会还决定把巴国民大会转为巴解放组织的临时国民会议,作为巴解放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同年6月,巴解正式成立。9月,第二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承认该组织是巴人的合法代表。

1965年1月1日,阿拉法特及其战友领导暴风部队的游击战士打响了反以侵略斗争的第一枪,这天就成为巴革命的爆发日。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阿拉法特一直活跃在东耶路撒冷地区,但因政治原因,他曾两次在叙利亚、一次在黎巴嫩被捕,后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化名为阿布·阿马尔,继续领导巴游击队从约旦边境和加沙地带向以发动袭击。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后,他领导暴风部队多次在以占领区作战,其影响不断扩大。

1968年,阿拉法特亲自指挥了著名的卡拉马战役。卡拉马位于约旦河东岸60公里处,是约旦境内的战略要地,自三次中东战争后,大批巴难民流亡到此,暴风部队也在这里建立了根据地,并经常从这里出发,向以开展游击活动,引起以的强烈不满。于是,以视卡拉马地区为眼中钉,制定了铲除暴风部队根据地的作战计划。1968年3月21日凌晨,以出动15000名士兵,兵分三路,在大批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大举进犯卡拉马城。

事发前,阿拉法特等人已预感到以行将发动进攻,采取了相应措施。他与约旦当局协同行动,将全城军民转移到安全地带,设下“空城计”,将暴风部队的突击队员埋伏在城后山区隐蔽地带。果不出所料,以军像阿拉法特等人设想的那样扑入卡拉马这座空城。这时,阿拉法特一声令下,埋伏在城后山上的暴风部队的突击队员像猛虎下山一样,英勇地攻入城内,与以军展开激烈搏斗。接着,巴人阵的突击队和巴民兵也赶来支援,约旦军民也积极配合。经3天激战,以军一败涂地,损失惨重,有400多名官兵被歼,一架直升机被击落,17辆坦克和装甲车被击毁。这次战役大灭了以侵略军的气焰,大长了巴勒斯坦、约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的志气。这次战役的胜利也使阿拉法特声名远扬,大大提高了他在法塔赫、巴解组织及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

1984年3月10日,正在约旦进行国事访问的李先念主席在哈桑王储陪同下来到卡拉马城,参观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卡拉马纪念塔,凭吊了卡拉马战役烈士墓。当时,我作为译员陪同参观。据哈桑王储介绍,这是为纪念在卡拉马战役中壮烈牺牲的官兵而建造的烈士墓和纪念塔。纪念塔上矗立着一尊战士塑像,战士头戴钢盔,右手持枪,左手挥向前方,展示了奋起反击敌军侵略的英勇气概。李先念主席深有感慨地说:“世界上没有不可战胜的军队。当年希特勒的军队最后还不是被消灭了吗!”哈桑王储听后点头称是,他接着说:“在阿拉伯语中,卡拉马是尊严的意思。而卡拉马战役就是为了捍卫尊严,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在卡拉马纪念塔前留下了珍贵的照片,这张照片我一直保存至今。

1968年6月,阿拉法特当选为法塔赫执委会主席。1969年2月,他接替艾哈迈德·舒凯里出任巴解执委会主席,成为巴事业的最高统帅。

在阿拉法特领导下,巴游击队在黎巴嫩迅速发展,在黎南部的阿尔库卜、马尔吉埃尤思等地建立了巴游击队基地,积极开展反以的军事活动。以企图摧毁这些基地,于1970年5月12日凌晨,在美国支持下向驻守在黎南部的巴游击队基地发动突然袭击。以军出动了大批飞机、坦克、半履带车,空降大批伞兵,向阿尔库卜、马尔吉埃尤思等地的巴游击队基地发动进攻。阿拉法特命令巴游击队坚决反击以军。暴风部队、闪电突击队及其他巴游击队英勇作战,在叙利亚、伊拉克空军和炮兵部队的支

援下,击毙击伤大量以军,摧毁一批以坦克和半履带车,击落数架以战斗机,破坏了几处以军基地,挫败了以军的这次袭击。

1970年6月9日,巴各游击队在约旦首都安曼召开紧急会议,阿拉法特被选为游击队总司令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其间,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处理巴游击队与约旦的关系问题,因为长期以来,巴约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占领了约旦管辖下的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致使大批巴难民流入约旦。与此同时,阿拉法特领导的暴风部队及其他巴游击队纷纷在约旦建立基地,不断发动对以的武装斗争,这激怒了以色列。以经常对约旦境内的巴人及巴游击队进行报复性袭击,从而也危及约旦安全。另外,随着巴武装力量在约的不断成长壮大,部分巴难民不愿受约旦法律的约束,约当局认为巴人在约境内已形成“国中之国”,对约王室政权构成威胁。约当局与巴解间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1970年6月,美国提出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罗杰斯计划”,巴解组织反对,美与约旦联合向巴解组织施压。同年8月,约旦接受“罗杰斯计划”,进一步激起巴解组织的不满,巴一些人士扬言,要解放巴勒斯坦,必先解放安曼。巴解组织与约旦当局的矛盾一触即发。

1970年9月初,发生了巴恐怖分子将一架西方商业喷气客机劫持到安曼的事件,接着又发生了企图暗杀侯赛因国王的事件。这两起事件终于激化了约巴间的矛盾。9月16日,约旦成立军政府,并立即宣布全国实行军管。9月17日,约旦当局派出大批军队包围巴难民营,向驻扎在安曼、扎尔卡、萨勒特、卡拉克等地的巴游击队发动进攻,解除其武装,将一些巴解组织负责人驱逐出约旦。阿拉法特命令各游击队在受到进攻时坚决自卫,双方展开激烈搏斗,冲突不断升级。在阿拉伯国家斡旋下,阿拉法特与侯赛因同去开罗出席阿拉伯国家紧急首脑会议,专门讨论约巴军事冲突问题。阿拉法特与侯赛因在会上各持己见,互相指责,互不相让,甚至拔出手枪相威胁,气氛相当紧张。纳赛尔展示了高超的调解艺术,对约巴双方分别做了大量工作。在8个阿拉伯国家的斡旋下,约巴双方于9月27日签署了14点协议,实现暂时妥协。

尽管约巴双方签署了实现暂时妥协的开罗协议,接着又签署了安曼协议,但双方的矛盾未能解

决。从1970年11月至1971年7月,双方的军事冲突从未间断。1971年7月中旬,约旦军队再次向巴游击队发动大举进攻,将巴游击队赶出安曼、伊尔比德等城市,攻占了巴解组织的大本营——杰拉什及在阿杰隆山区的基地。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巴游击队遭到重大挫折,丧失了约旦的最后几个基地,于1971年8月结束了其在约境内的军事活动。阿拉法特出于无奈,做出将巴解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游击队撤出约旦的决定。此后,他将巴解组织总部设在黎巴嫩,辗转于黎巴嫩、叙利亚等国。

巴解组织总部迁往黎巴嫩后,阿拉法特同时在多条战线上拼搏、奋斗。他一要在黎妥善安顿巴难民,建立并巩固巴游击队基地,进一步发展壮大;二须开展对敌斗争,从黎基地出发,深入到以境内或在黎以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同时要亲自指挥巴军队反击以不断派军到黎境内袭击巴游击队和难民营的战斗;三得在阿拉伯国家间进行周旋,为争取广大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与援助,并对阿拉伯国家间的分歧和纠纷进行调解、斡旋,对部分与巴解组织有矛盾的阿拉伯国家做工作,必要时进行一定形式的斗争;四要在国际上积极开展活动,宣传自己,扩大影响,争取支持,应对挑战,尽可能扩大巴解组织在国际的活动空间。

1973年10月,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法特领导的暴风部队和巴其他游击组织出动2.5万人次,参加战斗,在以军后方频繁出击,英勇作战,形成敌后第二战场,有力地配合了埃及、叙利亚在正面战场上的战斗。埃、叙军队和巴游击队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配合下,重创以军,打破了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长了阿拉伯人民的志气。通过这次战争的锻炼,巴解组织的实力进一步增强,阿拉法特的声望也进一步提高。

第四次中东战争刚结束,第六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于1973年11月在阿尔及尔举行,会议指出: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惟一合法代表,应恢复巴人的全部民族权利;以色列必须撤出它所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首先是耶路撒冷。阿拉法特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促使会议做出有利于巴勒斯坦的决议。

1974年是巴勒斯坦事业在国际上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10月26~29日,阿拉法特出席了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召开的第七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作

了重要发言,与大批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和会谈。最后,会议通过了约旦与巴解关系的决议,确认巴解是包括约旦河西岸巴人在内的全体巴人的惟一合法代表;强调巴人民享有返回自己家园和取得自决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享有在将来被解放的任何巴土地上建立独立国家政权的权利;呼吁约旦、叙利亚、埃及和巴解根据本协议规定,详细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要求所有阿拉伯国家支持巴人团结统一,不干涉其内政。

随着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发展变化及巴解地位的不断提高,1974年11月2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第3236号决议,确认了巴勒斯坦人民诸多不可剥夺的权利。阿拉法特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发表了长篇演讲,阐述了巴问题的历史、现状及巴解组织的主张。联大通过的关于巴问题决议使阿拉法特和巴解的地位得到加强,并邀请巴解以常驻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和工作。阿拉法特为巴解取得的这些成果做出了突出贡献。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东问题逐渐转入和谈阶段。随着中东和谈的深入和美苏在中东争霸的加剧,阿拉伯国家之间出现严重分歧。1976年后,埃苏恶化,埃美关系不断发展,并在美的斡旋和支持下,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但埃及的这一举动在阿拉伯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遭到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非议和反对。1977年12月5日,利比亚、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民主也门与巴解宣告组成反对埃及的拒绝阵线。该阵线成立后先后召开过五次首脑会议,阿拉法特都率代表团与会。于是,阿拉伯世界出现严重分裂,巴解与埃及的关系也不断恶化。

在这期间,阿拉法特在积极参加拒绝阵线活动的同时,把工作重心放在黎巴嫩,重点经营在黎的巴难民营和巴游击队基地。巴游击队主要集中在贝鲁特郊区和黎南部地区,巴难民营则主要集中在巴游击队周围地区,有的难民营就设在游击队基地。由于巴难民和巴游击队员基本都属于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们的活动得到了黎穆斯林的同情和支持,但却与黎的基督教势力发生了矛盾,以色列和叙利亚也乘机插手。

1977年7月,黎、叙和巴解签署了《什图拉协定》,重新确定了各自的活动范围。黎分成由几支不同派别武装势力控制的地区,北部由叙军队控制,

地中海沿岸多由黎基督教派武装力量控制,南部几块飞地由黎左派穆斯林势力和巴游击队控制。巴游击队不断从其控制的基地出发,向以发动袭击,引起以的强烈不满。以决定对驻黎的巴游击队进行报复,于1978年3月14日派兵入侵黎南部,占领了利塔尼河以南的大片地区,对巴游击队营地进行了摧毁性打击。阿拉法特命令巴游击队坚守阵地,顽强抵抗,与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经联合国斡旋,双方停火。根据联合国决议,以军撤出,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该地区,但黎、叙、以、巴解在该地区的摩擦和冲突仍不断发生。

1982年6月6日,以色列以巴解派人刺伤其驻英国大使、防止巴解对其进行袭击和骚扰、保障自己的边界安全为借口,出动军队大举进攻黎巴嫩。入侵部队兵分东、西、中三路,从地面、空中和海上向黎南部巴游击队基地和穆斯林武装力量集中驻扎地发动闪电式进攻。以军在6天之内占领了黎巴嫩1/4的领土,攻陷巴游击队在黎的大部分基地。6月9日,以军与驻扎在黎的叙利亚军队交战,接着,以军集中兵力包围巴解所在地贝鲁特西区。6月25日,以军切断贝鲁特——大马士革国际公路,紧缩对贝鲁特西区的包围,与巴解武装力量展开激战。

对阿拉法特及其领导下的巴解来说,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命运之战。以军进攻前,阿拉法特及其战友们详细研究了对敌斗争的作战计划,亲自查看了每个游击队基地和难民营的防守部署和应变措施。他要求全体巴军民要为生存、尊严和巴事业进行殊死搏斗,他发誓要与自己的兄弟姐妹和游击队官兵同生死、共患难。以军通过各种手段,千方百计掌握阿拉法特的行踪,企图从肉体上消灭他。阿拉法特面对危险,镇定自若,机智勇敢地面对各种险情,夜以继日地指挥战斗。每天,他都以充沛的精力处理问题,召开会议,与外界联系,经常冒着枪林弹雨,走进战壕,鼓励官兵士气,研究作战部署,有很多次死神从他面前溜走或与他擦肩而过。一次,以战斗机发现了阿拉法特,向他俯冲下来集中进行攻击,炸弹就落在距他仅数米的地方。另一次,以军轰炸机发现了阿拉法特乘坐的汽车,便一股脑儿地向这辆汽车投放炸弹,直到把这辆汽车炸得粉碎,以军以为他已被炸得粉身碎骨,但事后了解到,阿拉法特根本不在这辆车上。还有一次,以军侦察到阿拉法特刚进入一处掩体,便集中火力将

此处掩体完全摧毁,以为他必死无疑,但就在当日,以军却发现他又活跃在贝鲁特其他地方。当以军向他掉转枪口时,阿拉法特又突然踪影全无。在贝鲁特被围困的两个多月里,阿拉法特几乎天天与以军捉迷藏,每天转移好几个地方,从不在一个地方久留。有时他一连几天几夜不脱衣睡觉,有时仅抽空打个盹儿,有时带上一两个警卫人员到不易被以军发现的旷野掩体内休息片刻,有时走进刚被以军轰炸的空楼里办公。他多次到贝鲁特南部桥下阅读文件,处理问题。他的生活简朴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一杯红茶、一块奶酪、几片面包和几粒橄榄对他来说足矣,这也是他的家常便饭。

阿拉法特对自己的人民和战士无限关心和体贴,不论走到哪里,人们总是纷纷将他围住,亲切地称他为阿布·阿马尔兄弟。他常深入到巴难民营,关心他们的疾苦。他不止一次地亲自安排烈士的后事,帮助解决家属的困难。人们总认为,像阿拉法特这样的人,应该属于“丈夫有泪不轻弹”的人物。就巴人的一般印象,阿拉法特也是从不轻易掉泪的人,然而,在贝鲁特被围期间,一天,他去看望巴难民营的一所幼儿园,以军认为他在这办公,就派飞机袭击这所幼儿园,致使许多儿童命丧黄泉。阿拉法特闻讯后嚎啕大哭,深感内疚,万分愤慨地说:“这些孩子天真无辜,何罪之有,难道因为我来看望过他们就把他们埋葬在废墟之下吗?”这期间,一名美国女记者曾到贝鲁特采访“暴风部队”司令等巴游击队部分负责人时问,阿拉法特的特点是什么?她得到的回答是,阿拉法特的心胸像大海,性格似高山,又像橄榄树一样文雅,其枝叶伸向高空,其根深扎于大地。

1982年7月10日,正当以军围困贝鲁特欲将巴解武装力量及阿拉法特本人置于死地之时,阿拉法特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向阿拉伯人民群众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介绍战场形势,重申他们的信心。他在公开信的结尾引用了这样一首诗:人民一旦要求生存之权,命运之神定会听从召唤;漫漫长夜终有尽头,沉重枷锁定被砸烂。不愿攀登高山的怯懦之辈,只能永远在深渊中忍受熬煎;不爱生活的昏庸之辈,像阳光下的水珠瞬息消散。信的最后是:“革命直到胜利!”它代表了巴人的心声。

阿拉法特领导巴军民与以军在贝鲁特激战两个多月,处境越来越艰险。以军加大对贝鲁特轰炸的

力度,每天出动250多架次轰炸机,从凌晨6时到晚9时连续对巴难民营和游击队基地进行狂轰滥炸。以军还伙同黎基督教民兵对夏蒂拉和萨布拉两难民营内的1000多名无辜平民进行血腥屠杀,连吃奶的幼儿也不放过。8月19日,黎、以和巴解在美国斡旋下达成停火、撤出巴解武装和部署多国部队的协议。为保存实力,减少牺牲,阿拉法特决定将巴解组织总部迁往突尼斯,巴解战士12万多人随身携带轻武器撤出黎巴嫩,分别转移到叙利亚、约旦、突尼斯、伊拉克、苏丹、南北也门和阿尔及利亚8个阿拉伯国家。

经过这场战斗洗礼的阿拉法特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他说:“巴勒斯坦革命的道路并非是铺满玫瑰花的平坦之途,返回家园的胜利成果也不是金盘中的礼物,需要巴勒斯坦人民进行长期的、艰巨的斗争。”

巴解总部迁往突尼斯后,阿拉法特面临领导该组织何去何从的问题。这时,国际社会主张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政治解决的呼声更加高涨,阿拉伯国家的主流派也主张顺应这一历史潮流,拒绝阵线困难以阻挡这一潮流的冲击而名存实亡。阿拉法特在对形势进行了深入研究后,审时度势,决定走和谈之路。

1982年9月1日,美国总统里根提出解决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建议在约旦河西岸实行巴人自治,并与约旦建立某种形式的联邦。同年9月,第十二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在摩洛哥非斯召开,阿拉法特率巴解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解决巴问题的统一方案,即《非斯宣言》,方案提出了解决中东问题的八项原则。这是阿拉伯国家第一次集体制定的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和平方案,确定了以政治外交手段为主的对以斗争策略。方案既坚持以色列必须撤出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确认巴人的合法权利,实际上又含蓄地承认了以的存在,这对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解决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也遭到某些方面的抵制和反对。

阿拉法特奉行和谈路线在“法塔赫”内部引起不同反响,以阿布·穆萨为首的激进派对此提出异议。阿布·穆萨1927年出生,早年加入“法塔赫”,在该组织中有一定影响,并一直与叙利亚保持密切关系。1982年贝鲁特被围期间,他作为巴游击队联合武装部队总作战部部长助手,在对敌斗争中发挥

了应有的作用,但他反对阿拉法特的巴解及其武装力量撤出贝鲁特的决定。此后,阿拉法特任命他为作战部长,他仍反对阿拉法特的政治路线、非斯和平方案及约巴对话与最终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主张……显然,他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阿拉法特。1983年5月,穆萨宣布成立“巴勒斯坦革命运动”,要求开会纠正错误路线,成为法塔赫的反对派。5月28日,在叙利亚军方支持下,他控制了法塔赫在大马士革的六个办事处和仓库。接着,以穆萨为首的反对派向阿拉法特领导的在黎巴嫩的武装力量发动进攻,双方展开激战。阿拉法特为减少损失,决定将自己的部队集中到黎北部城市特里波利。11月3日,穆萨领导的反对派向阿拉法特在特里波利的部队发动进攻,攻占了阿拉法特部队在特里波利市郊的最后两个主要营地。11月22日,反对派集中力量围攻阿拉法特总部,双方相距仅数百米。在阿拉法特处境最危险的时候,埃及向他伸出了援手,一些阿拉伯国家也大力斡旋。11月25日,沙特、叙利亚、黎巴嫩会同巴解各方,达成阿拉法特所属部队撤出黎的协议。阿拉法特被迫率“法塔赫”4000名武装人员撤出特里波利,乘坐希腊轮船,由法国海军护航,分赴各阿拉伯有关国家,与1982年从贝鲁特撤出的巴解游击队会合。

阿拉法特的总部虽设在远离巴勒斯坦的突尼斯,但他一刻也没忘记巴事业,他认为加强约巴对话是通向解决巴问题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途径。1985年2月11日,阿拉法特与侯赛因国王在安曼达成解决中东问题的联合行动方案,被称为约巴联邦方案。之后,国际社会有关各方围绕中东和谈问题积极进行活动,先后提出不少与之有关的建议。而约巴双方就如何实施这项方案进行频繁接触,阿拉法特和侯赛因国王不断就各自代表团的工作做出指示。在会谈过程中,双方出现一些分歧,关键性意见有两点:双方对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政治前途存在争议;约旦坚持以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为基础实施约巴联邦方案,以便通过和谈早日收复约旦河西岸领土,进而在约巴联邦范围内解决巴自决权问题。巴解则认为安理会第242号决议既未承认巴解是巴人的惟一合法代表,也未规定巴人的自决权,坚持必须将安理会第242号决议与巴自决权联系起来。此外,美、以又坚持拒不承认巴人的自决权,也不同巴解谈判的立场,使约巴对话陷入僵

局。1986年2月9日,侯赛因国王宣布中断与巴解的政治协调关系,关闭巴解在安曼的25个办事机构。1987年4月20日,阿拉法特宣布废除约巴间的这项方案。

就在约巴关系发生急剧变化之时,我于1986年初由中国驻埃及使馆转到中国驻约旦使馆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我有机会接触到侯赛因国王、哈桑王储、首相、大臣、将军及大批约旦朋友,同时,我也有机会在安曼接触到大批巴勒斯坦朋友。我一直在密切关注中东和谈进程及有关方立场,掌握了约、以、巴关系重大变化的第一手材料。

约巴联邦方案的废除不仅给约巴关系带来影响,也使巴事业再度面临困难。阿拉法特及其战友在思索、寻找出路。他们把目光投向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那是他们的根据地,也是他们的最终出路,于是决定加强被占领土的工作。1987年底,爆发了被占领土巴人的起义。

1987年12月8日,在以色列占领的加沙地带发生了以军车撞死巴无辜平民事件,激起巴人极大愤怒。次日,加沙的巴人民举行反以占领的起义,起义斗争迅速发展到了约旦河西岸,巴人到处举行抗议示威游行和罢工罢市,他们不畏强暴,前赴后继,同仇敌忾,英勇反抗以军占领和残酷镇压,用石头对付以军的枪弹,所以这场起义被人们称为“石头革命”或“石头起义”。以当局对被占领土巴人的起义斗争进行了血腥镇压,造成数百名巴人死亡,2万多人受伤,1万多人遭逮捕、监禁。

阿拉法特极为重视被占领土巴人的这场起义,他领导的巴解参与了这场起义的领导和组织工作。被占领土各地成立了各级人民委员会,各行各业、各年龄层次和各阶层的巴人都参加了起义,青年一代成为这场斗争的主力军。起义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斗争规模之大、产生影响之深,都是巴人斗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巴人用流血牺牲的巨大代价进一步唤起了国际社会对巴问题的关注,赢得了世界人民对巴事业的普遍同情和支持,推动了中东和平进程;同时也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沉重打击了以色列当局对被占领土的统治,进一步提高了巴解的地位。

被占领土巴人的这场起义震动了中东和世界。1988年6月,阿拉伯国家特别首脑会议在阿尔及尔召开,阿拉法特与会,会议做出了(下接第12页)

国干涉他国内政,甚至不惜使用军事手段,使整个地区处于不稳定的动荡局面,如厄立特里亚脱离埃塞俄比亚的独立战争、苏丹内战、卢旺达与布隆迪两国间的部族战争、民主刚果的内战、埃塞俄比亚同厄立特里亚的边界战争、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为水资源而引起的长期紧张关系、埃及与苏丹为分配尼罗河水的份额而引发的时断时续的分歧与紧张关系等。

总的看,尽管世纪之交,尼罗河流域各国在尼罗河的治理、水资源开发与利用等诸多方面的合作上都表现出了积极性、主动性,初露曙光,但不可忽视的是历史与英国殖民主义遗留的诸多问题和分歧仍构成了对各国的合作的挑战。此外,还必须看到,由于尼罗河流域各国大都贫穷落后,科学技术不发达,在全面合作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尚不可能有大的进展,尽管已出现全面合作的良好开头,但还并未完全消除流域的紧张关系与解决相互

(上接第22页)有利于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决议。同年7月底、8月初,约旦侯赛因国王在约巴关系尤其是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关系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7月28日,约内阁宣布取消一项投资为13亿美元的约旦河西岸社会和经济1986~1990年五年发展计划;7月30日,侯赛因国王签署一项法令,解散半数为约旦河西岸巴人的众议院;7月31日,侯赛因国王宣布,约旦断绝与约旦河西岸的法律行政关系;8月4日,约旦内阁会议决定,从1988年8月16日开始,让约旦河西岸各民政机构工作的2.12万名约旦雇员退休或离职;8月6日,约旦内阁根据侯赛因国王的命令进行改组,撤消被占领土事务部,改为外交部下属的巴勒斯坦事务司。

1988年8月23日,阿拉法特签署了关于巴解接管约旦河西岸的初步措施文件,它包括在被占领土现行的法律、规定和决定将延续到巴勒斯坦立法机构对其进行修改或宣布无效时为止;受雇于约旦政府在约旦河西岸工作的2万名巴人应继续留在他们的工作岗位,巴解将根据劳工法对受约旦决定影响的雇员和工人完全承担责任。

在巴人斗争出现较好形势的背景下,阿拉法特抓住有利时机,决定建立巴勒斯坦国。1988年11月,巴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在阿尔及尔举行,来

间的信任问题,也没能改变各国把自身利益置于地区整体战略利益之上的传统观念,各国所面对的历史遗留问题、各国的政治敏感性与发展所遇到的现时挑战,将继续限制与阻碍未来的全面合作。因此,对流域各国的合作还有待深入研究,若能将地区整体利益与本国利益结合起来考虑,合作的曙光才能上升为普照整个地区的艳阳。

注 释:

[1]〔埃及〕阿卜杜·沃哈卜:“尼罗河流域国家的倡议”——地区的新曙光,载《国际政治》2002年第149期126~131页,埃及开罗金字塔商业出版社。

[2]〔埃及〕穆罕默德·奥塔·穆罕默德:《尼罗河》,埃及图书总机构出版社1998年版。

[3]游航:《中东之水,其贵如血》,载《阿拉伯世界》1996年第3期。

[4]孔令涛:《世纪忧患——阿拉伯国家的水资源问题》,载《阿拉伯世界》1999年第2期。

自巴解7个派别的448名代表、32名被以色列当局从被占领土驱逐的巴活动家及70名巴解驻世界各国办事处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宣告巴勒斯坦国成立,首都定在耶路撒冷。会议确认巴接受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181号决议与安理会的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确认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地区和国际冲突;谴责对别国使用武力威胁,摒弃和反对恐怖活动……会议还要求以色列撤回到1967年的边界以内,把东耶路撒冷归还巴国;要求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置于联合国监督之下;重申巴国与约旦结成联邦。1989年4月2日,阿拉法特当选为巴勒斯坦国的第一任总统。

巴勒斯坦事业的发展是复杂曲折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自1989年底以来,苏联、东欧剧变,对中东形势产生冲击;大批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美国中断与巴解对话;以色列组成右翼内阁,政治解决中东问题的努力受挫,巴问题自然受到重大影响。1990年8月海湾危机爆发,接着又爆发海湾战争,阿拉伯国家出现严重分歧,国际社会对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大为减少,中东和谈被置于次要地位。在这一时期内,阿拉法特及巴解把主要精力投入研究和处理与海湾危机及海湾战争有关的问题中。